

题目：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
以潮州市意溪镇为研究样本

硕士生：张璇

指导教师：黄虹教授

专业：音乐学

研究方向：音乐心理学

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

二 00 七年十二月

目录

第一部分	1
一、选题原因及研究对象	1
二、学科归属及概念界定	3
三、文献收集及现状评述	6
第二部分	7
一、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7
二、逻辑框架及具体对策	10
三、研究的理论意义	12
四、论文的内容框架	13
第三部分	15
一、研究的伦理问题	16
二、研究的时间安排	18
三、研究的经费预算	17
参考文献	18

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

——以潮州市意溪镇为研究样本

(开题报告)

第一部分

一、选题原因及研究对象

潮州大锣鼓自脱胎于潮州正字戏(也称正音戏),成为一种在潮州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已有漫漫百多年。回望潮州大锣鼓的发展历程,不由让人感慨:民间音乐的魅力,谁能抵挡!作为土生土长的潮州人,家乡的一草一木、一阡一陌,寄托着游子的情思;家乡的民俗风情、潮乐印象,融入了儿时的期盼;家乡充满热情、富有年节气息的潮州大锣鼓游行,成为离乡人对家乡的思忆。于是,在对家乡音乐的热情与专业研究的激情之间,选择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成了笔者选题的初衷。

本国音乐心理学思想虽历史悠久¹,但作为独立学科,走入音乐专业院校的时间却不很长,亟待专业研究者们为其添砖加瓦,选择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课题,无疑对音乐心理学会是一个拓展。现今,心理学的本土化²研究越来越受国内心理学家的重视,在音乐心理学界,罗小平教授就曾为此呼吁³,因此,选择与本土音乐有关的本土化研究课题,是笔者为选题所做的重点考虑。

潮州大锣鼓自出现,便作为潮州民俗活动“游神赛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天,在潮人心中,其作为潮州本土音乐民俗文化的概念已被一致认同⁴。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认为,“文化系统”

¹ 罗小平在《中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起、承、转、合》(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中谈到,中国音乐心理学思想的发端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² 杨国枢在《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载《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中提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契合性的标准”。另谈及“本土契合性”指“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与契合”(2004: 27—28)。

³ 见罗小平《从转型走向整合——中国音乐心理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她在其中谈到,要“中国音乐心理学的发展要立足于本土,就是要挖掘、整理中国古代丰富的音乐心理学思想精华,尤其是独具特色的表演心理体验。又要以中华民族的音乐实践为基础,整合中外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

⁴ 来自笔者对潮州本土人的访谈笔录,及在量表调查阶段所得数据。

¹为社会中个体提供了共享的有意义的符号（周晓虹、徐彬译 2002：25）。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²以其特殊的符号形式，定义了自身的社会角色，并在其角色塑造过程中，以自身的价值与规范，引导观众的行为与观念，并与其观众互为关系。因此，在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此种以物质文化为载体的观念文化的考察中，聚焦于观众对文化客体的接受状态，可从心理学意义上了解观众对于社会生活中文化模式的接受心理，把握观众对于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此一社会角色的价值评价。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认为，态度经常指向某些事体，故它可以解释作指向某种价值的个人的心理状态（杨国枢、文崇一、吴聪贤、李亦园 2006：374）。故在 2005 年及 2006 年两个春节的实地考察之后，笔者确定潮州大锣鼓观众态度为研究对象，并最终将论题定为“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以潮州市意溪镇为研究样本”。

在此，有必要对为何选择潮州市意溪镇作为研究样本做出解释。

首先，应从意溪镇的地理、文化、风土习俗，及潮州大锣鼓在意溪的发展状况谈起。意溪位于潮州古城北郊，与市区仅一江（韩江）之隔，是附属于潮州市湘桥区的一个镇。意溪，古名“恶溪”、“鳄溪”，既指流经潮州市区的一条河流，又指河流北岸的一块陆地。传说很久以前，溪中有鳄鱼，经常作恶，伤害到江边洗衣取水的人，百姓痛恶这条溪水，故把它称作“恶溪”。后被贬至潮的潮州刺史韩愈，作《祭鳄鱼文》，又把牲畜投入江中，以飧鳄鱼，才驱走了溪中作恶鳄鱼。因“恶溪”不“恶”，又因“恶”与“意”在潮州方言发音近似，人们遂以“意溪”替之，潮人为了纪念韩愈为潮州百姓所作的这一功劳，在清代把这条河流改名“韩江”，但“意溪”这个地名却保留了下来，故从这个地名，可洞见意溪镇悠久的历史。

意溪早期以土著农耕文化为基础，先后接纳了畬族文化，东南沿南地区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以及韩江上游的客家文化，还有古越族支系的旦家人的海洋文化（黄钦赐，2006），这些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今天独特的意溪文化。意

¹ 帕森斯“以科学的观点把（个体行为者的）互动过程看做一个系统，并运用已成功地应用于其他科学的对系统进行分析的理论方法加以考察”（转引侯均生主编 2006：172），其把行为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这种系统与功能“四分法”，大到可以用于解释整个人类社会，小到可解释某一制度（侯均生主编 2006：175），其中的文化系统定义了一个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模式化或制度化体系。帕森斯对价值与规范有其感兴趣，他认为，文化借助这些价值与规范来引导社会中个体的行动（周宪、许钧主编；5 周晓虹、徐彬译）。

²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此种应用于潮州本土传统民俗之中的潮州大锣鼓表演形式称为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具体说明见下文叙述。

溪到清代仍是商业文化,商业发达、娱乐消费很是旺盛,清朝中期之后,才转为农业文化¹。农业与土地紧密相关,土地是当地人的衣食、精神寄托,因此春祭承载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春祭是潮州人的风土习俗,“初春农闲的时节,各地有游神行乐的习俗”(沈敏,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意溪自然不例外,而游神赛会离不开渲染气氛、喜庆欢腾的潮州大锣鼓。在游行大锣鼓响遍潮州城内的同时,在潮州城外,意溪的潮州大锣鼓也发展起来,以致城内正月二十“安济圣王”出游,都要邀请意溪的各个锣鼓班前去助兴,名为“请老亲”,由此可见意溪当时潮州大锣鼓的发展状况。

意溪镇潮州大锣鼓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在此百多年间,名家、名师辈出,这些名家名师为潮州大锣鼓的传承作出极大贡献,如意溪镇橡埔村锣鼓师傅许裕兴(1872—1959),又如意溪东洋温锣鼓师林坤河(1917—2003)等人,他们的辛勤传艺,使解放前的意溪镇鼓乐繁盛,远近闻名;他们奔走潮州各地区,“为传播潮州大锣鼓的演奏艺术竭尽全力”(意文,2003)。而弟子们对潮州大锣鼓的大力传承,使意溪镇潮州大锣鼓至今为人称道。据了解,意溪镇现有“十四支潮州大锣鼓队,人数达到1400多人”²。2004年,意溪镇被广东省文化厅授予于“广东省潮州大锣鼓之乡”的美誉³。

其次,笔者是潮州市意溪镇人,潮州大锣鼓的年节印象,已融入笔者的记忆,另外,文化局内人的身份,无论在语言沟通上,或是在心理行为的本土契合上,都为研究提供了方便,故取意溪镇为样本,有出于地利人和之考虑。

二、学科归属及概念界定

(一) 学科归属

本论题所属领域为音乐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usic)。音乐社会心理学是音乐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它在早期音乐心理学研究者关注文化于音乐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并在重新确立文化决定性之重要地位的观念牵引下建立。从早期 Farnsworth 的《音乐社会心理学》(1954, 2/1969)到 Hargreaves 和 North 主编的《音乐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usic),音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特点逐渐鲜明, Hargreaves 和 North 主编的《音乐社会心理学》中,

¹ 引自笔者的音乐人类学学期作业《正月初六游神会》

² 资料来自意溪镇文化站“申遗”文件:《潮州大锣鼓之乡——意溪镇》

³ 引自2004年11月出版的《意溪文艺》第二期,见p39文化信息。

就强调从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角度展现音乐社会心理学的特色。本研究将充分体现音乐社会心理学特点,在音乐社会心理学倡导多学科交融的观念指引下,援引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及理论,并将其纳入研究逻辑架构之中。

(二) 概念界定

1. 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界定

潮州大锣鼓出现以来,一直以游行的形式配合潮州春节的民俗活动——游神赛会,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解放后,潮州大锣鼓的表演空间虽不再局限于春节民俗活动,逐渐发展至舞台,参与到节日活动和比赛之中,甚至在今天,音像制品、电视媒体均可见潮州大锣鼓的身影,但是,春节的潮州大锣鼓游行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活动形式,始终活跃于民间。

由于社会及文化的变迁,意溪镇春节的潮州大锣鼓游行活动,现今以三种形式出现:第一,正月初一以向四乡六里拜年、活跃新年气氛为目的,不出神轿神驾的纯潮州大锣鼓游行形式。第二,正月初六配合游神赛会,有神轿神驾的传统民俗活动形式。第三,正月十六配合意溪文艺巡演的潮州大锣鼓游行形式。需说明的是,正月十六的活动形式本与正月初六同,甚至在规模上更甚于正月初六,但近些年经政府改造后,成为带政府宣传色彩的活动形式。由于第二种游行形式年代最为久远且最为传统,所拥有之观众最具覆盖性,所负载之社会及文化变迁的信息最为丰富,故本研究所考察的潮州大锣鼓游行形式为第二种——传统民俗活动形式,将其界定为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

2. 态度的界定

态度(attitude)是社会心理学一个既广泛又重要的概念,由于它所涉及的方面众多,自19世纪末为心理学家朗格(Lange, 1888)发现¹之后,社会心理学家对它的定义各不相同、各有侧重。故在本研究中,对态度作出何种界定,显得相当重要。

本研究中采用的“态度”定义来自Katz与Stotland(1959,转引杨国枢、叶明华2006:136)所用的广义定义。根据Katz与Stotland的广义定义,态度乃指个人对特定对象,或人、或事、或物所持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cognition)、

¹ 也有学者认为“最早使用态度一词的心理学家可能是H. Spencer,他于1862年在其所著《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里,强调一个人的态度对争论事项的鉴别有重要的影响”——资料来源:杨国枢、文崇一、吴聪贤、李亦园著《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2006)

情感(affect)及行为倾向(behavioral intention)。

按照这个定义,态度有三个层次:

(1) 认知:对态度对象及其相关人、事、物的认识、意见、信念及评价。

(2) 情感:对态度对象及其相关人、事、物的情感、情绪、感受(或体验)。

(3) 行为倾向:对态度对象及其相关人、事、物的行为意愿(behavioral intension)及反应倾向(response tendency)。

以上三个层次是相互协调一致的,态度中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层次十分和谐,并无矛盾(时蓉华,1998:297)。在三个层次的相关程度上,屠文淑(2002:55)认为:认知、情感、意向¹三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却不相同。情感与意向的相关程度高于认知与意向或认知与情感。在态度的认知要素与情感要素不一致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取决于情感因素。情感要素在态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杨国枢(2004:202)在其孝道态度研究中也有谈及:态度的三个层次,互相之间并非独立,而是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大致而言,认知与情感可能互相影响,两者又皆可能影响意志²。

3. 观众态度的界定

观众态度是明确了态度主体的一个态度系统,在本研究中,观众态度的指向客体明确为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依照以上态度的定义,将观众态度界定为:观众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所持有的一套复杂而有组织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倾向的系统。此系统同样有三个层次:

(1) 观众认知:作为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认识、意见、信念及评价;

(2) 观众情感:作为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情感、情绪及感受(或体验);

(3) 观众行为倾向:作为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行为意愿及反应倾向。

由于态度是一种假设或内隐的变量,而不是立即可观察得到的(杨国枢、文崇一、吴聪贤、李亦园,2006:374),故本研究将依据观众态度内涵,编制有关量表来进行测量,关于态度各层次之间的相关及相关程度,也将成为测量的一部

¹ 意向也即行为意向,与行为倾向同。

² 杨国枢所说的意志与上文的行为倾向、意向、行为意向均同义。

分内容。

三、文献收集及现状评述

由于本研究对象为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故笔者从此原点辐射开来,围绕“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观众”及“态度”三大范围,从关于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研究、与本研究相关的观众心理研究,以及国内外音乐心理学领域关于态度的研究三个方面收集文献,并对文献做出阅读和综述,当然,此一工作将作为研究的重点贯穿研究的全过程。

据目前对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

(1) 对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虽已有不少研究者分别从民间音乐,民俗信仰,以及仪式、音乐和社会的综合角度¹对其进行研究,但对民俗活动中参与者心理的专题研究,尤其观众心理的研究仍是空白。刘铁梁(1996)曾说:“很难想象在民俗调查中可以有根本不顾及心理问题,对民俗社会中人的内心生活完全不予体验的情况”,他更以村落集体活动“舞龙灯”举例,谈到“在龙灯队从村里到村外,从广场到每家院中的行进途中,表演者与观众的心情和想法,已经达到互相感染和理解的默契程度,这中间,每一个人都在群体环境当中发生着认识、情感、意向等心理活动”。R·R·马雷特在其《心理学与民俗学》(1988: 1)开篇便提:“民俗学不能将自身局限于仅以纯粹的社会学观点,即外观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最终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和解释人类精神的活动,但在它目前的发展阶段上是不能将心理原由排除在外的”。这是民俗学家对于心理学地位的评价,笔者在此借用他们的角度和立场,阐明心理学在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研究的重要性,以说明从音乐社会心理学视角来观照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的适宜性和迫切性。

(2) 与本研究相关、已有的观众心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戏剧领域,在这一领域,剧场对观众心理的影响,观众对舞台的反馈,以及剧作、演出如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均做了相当丰富论述,对观众的情感、感知等也有所涉及,毋庸置疑,这些方面都与观众对艺术活动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诸论著都没有正面谈及

¹在已经发表的论著中,从民间音乐的角度涉入,谈及潮州大锣鼓游行的论著有陈俊麟主编的《潮州市民间音乐志》(1989),陈天国收入《潮州音乐》一书中的《潮州大锣鼓》(2004),以及黄唯奇、黄义孝的《潮州大锣鼓的演变和发展》(2002),蔡树航的《潮州锣鼓乐》(2003);从民俗信仰的角度涉入,提到潮州大锣鼓游行的有方烈文著《潮汕民俗大观》(1996),黄挺著《潮汕文化源流》(1997);从仪式、音乐和社会的综合角度涉入,对其进行研究的有民族音乐学者薛艺兵著《神圣的娱乐》(2003)中“宗族型音乐祭礼——以广东潮州拜老爷活动为例”。

观众态度,对观众心理的描述也仅从审美一维,缺少多维的观照。笔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以及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观众的观察,均表明观众态度远不止于审美一维,实用、娱乐等维度也是观众态度的内涵组成。

(3) 国外音乐心理学在态度领域的研究已比较成熟,从文献可见,无论联系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其进行研究,还是对其的成因、影响作出说明,成果都相当突出。可以说,国外音乐态度和偏好的已有研究成果是进行本态度专题研究的丰厚沃土。

(4) 国内音乐心理学至今未见态度专题研究,这既是缺憾,同时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

第二部分

一、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有以下三个:

问题一: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游行的场景如何?民俗活动场景中的观众有何外在行为表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为问题二提供文本数据。

问题二:观众态度三个层次之间的相关性、观众态度与其三个层次间的相关性、观众态度三个层次中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不同观众群体的态度程度所呈现的差异。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1. 观众态度的三个层次,观众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之间有相关;
2. 观众态度分别与它的三个层次,观众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之间有相关;
3. 观众认知各维度之间有相关;
4. 观众行为倾向各维度之间有相关;
5. 观众情感各维度之间有相关;
6. 不同年龄的观众群体在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7. 不同性别的观众群体在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8. 不同教育程度的观众群体在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问题三:不同观众群体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价值评价,以及潮州大锣鼓在现代社会的适宜性。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为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在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定量研究(quantitative)和定性研究(qualitative)仍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音乐心理学领域也是如此。

随着音乐心理学学科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附属于主流学科的分支学科，如音乐的认知、行为和社会方面(David J.Hargreaves and Adrian C.North, 1997: 3)，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日益多元，研究方法多元及整合(integrate)¹的趋势在所难免，故音乐心理学研究者需在本学科发展现状下，在对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作出探究的基础上，界定不同的方法本质和特征，选择适合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及与研究对象相应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从论题“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以潮州市意溪镇为研究样本”的析得“民俗活动”、“潮州大锣鼓”、“观众态度”三个中心词汇，这不仅道出论题的研究领域归属，也讲明在研究对象背后的情境性及文化性，若单选用定性研究方法，难以取得态度程度的量化数据，以进行对不同群体间态度的比较；而单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测量工具、收集数据，运用统计学进行分析的结果，一来无法为态度测量提供现场观察的第一手资料，编拟出具有效度测量量表，二来无法挖掘到态度背后隐藏的意义和解释。观众态度来源于观众的现实生活，成长环境，他们的经历，直接影响其对潮州大锣鼓的主观性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这其中有可量化、也有不可量化的心理因素，假如只局限于探寻简单的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就无法对态度测量的结果做出有力、丰满的分析。出于这些考虑，本研究将以实用主义(pragmatism)知识观²为指导，以解决研究问题为重心，采用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以期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逻辑和研究模式的支撑。

混合研究³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相对较新(John W. Creswell 著，崔延强等译，2007: 165)。它“是指在一个单一的研究中综合运用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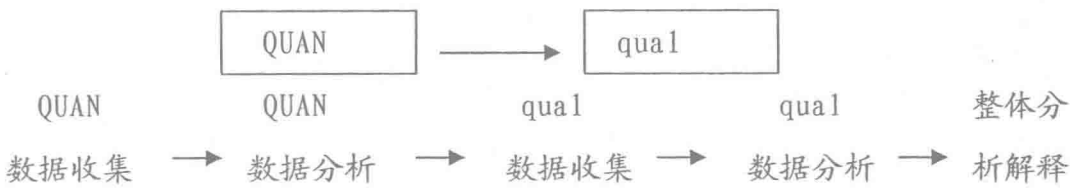
¹ 整合：整合即是将研究方法混合，意味着研究者将研究数据“混合”。

² 实用主义知识观：实用主义关注实用——“什么有用”——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方法相比，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要使用所有的方法以解决问题(Rossman & Wilson, 1985)。——资料来源：John W. Creswell 著，崔延强等译，2007: 9。

³ 这种方法有多个不同的称谓，如整合(integrate)、综合(multimethod)、定性和定量方法、多重方法(multimethod)和多重方法论(multimethodology)等，但最近的文献都采用“混合研究”这一称谓(Tashakkori & Teddlie, 2003)(John W. Creswell 著，崔延强等译，2007: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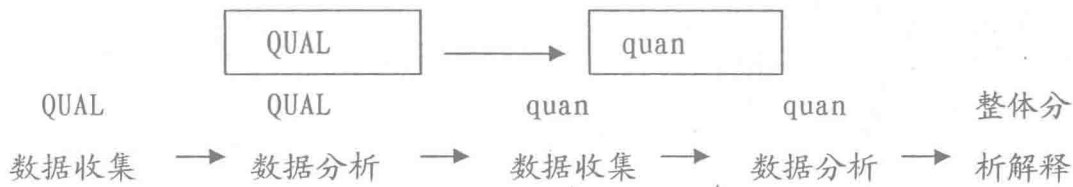
集和分析资料”（John W. Creswell 著，崔延强等译，2007： 12）的一种研究方法。本研究将在克雷斯威尔的混合研究策略和可视模型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实际，进而提出适合于本研究的策略及可视模型。现将克雷斯威尔（Creswell，2003）所提出的研究策略及其可视模型说明如下：

图 1: a. 顺序性解释设计 (sequential exploratory strategy)



顺序性解释策略的特点是定性数据收集和分析在定量数据收集和分析之后，通常是定量数据优先¹。这两种数据在研究的解释阶段进行整合。顺序性解释策略设计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结论来对初步的定量研究结果予以辅助性解释和说明（John W. Creswell 著，崔延强等译，2007，P170）。

图 2: b. 顺序探究设计 (sequential exploratory strate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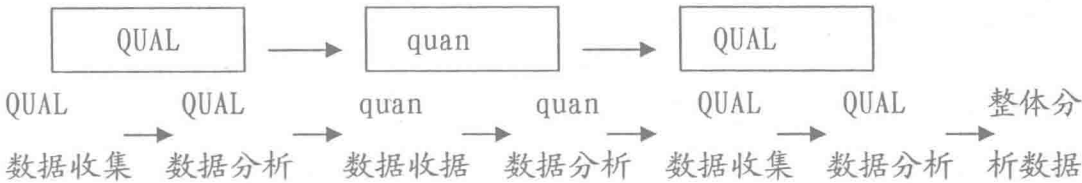
顺序性探究策略和顺序性解释策略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它也分两个阶段实施，并且通常对第一个阶段优先。与顺序性解释策略相反，这一模型的特点是，定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在定性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之后，因此，研究中定性的方面具有优先性，两个阶段的结果在解释阶段加以整合。这种策略的目的是用定量的数据和结果来辅助说明定性的结果（John W. Creswell 著，崔延强等译，2007，

¹ 优先：混合法研究中的优先取决于在研究中是首先强调定量信息还是定性信息这一策略选择和对不同类型的数据类型的处理范围，以及作为研究的归纳或演绎框架的理论运用（John W. Creswell 著，崔延强等译，2007），在这里没有更强调哪个研究的意味。

P170)。

在克雷斯威尔等人所提出的顺序性解释策略和顺序性探究策略的基础上，将这两种策略加以整合，提出本研究的研究策略及其可视模型：

图 3：顺序性探究 + 解释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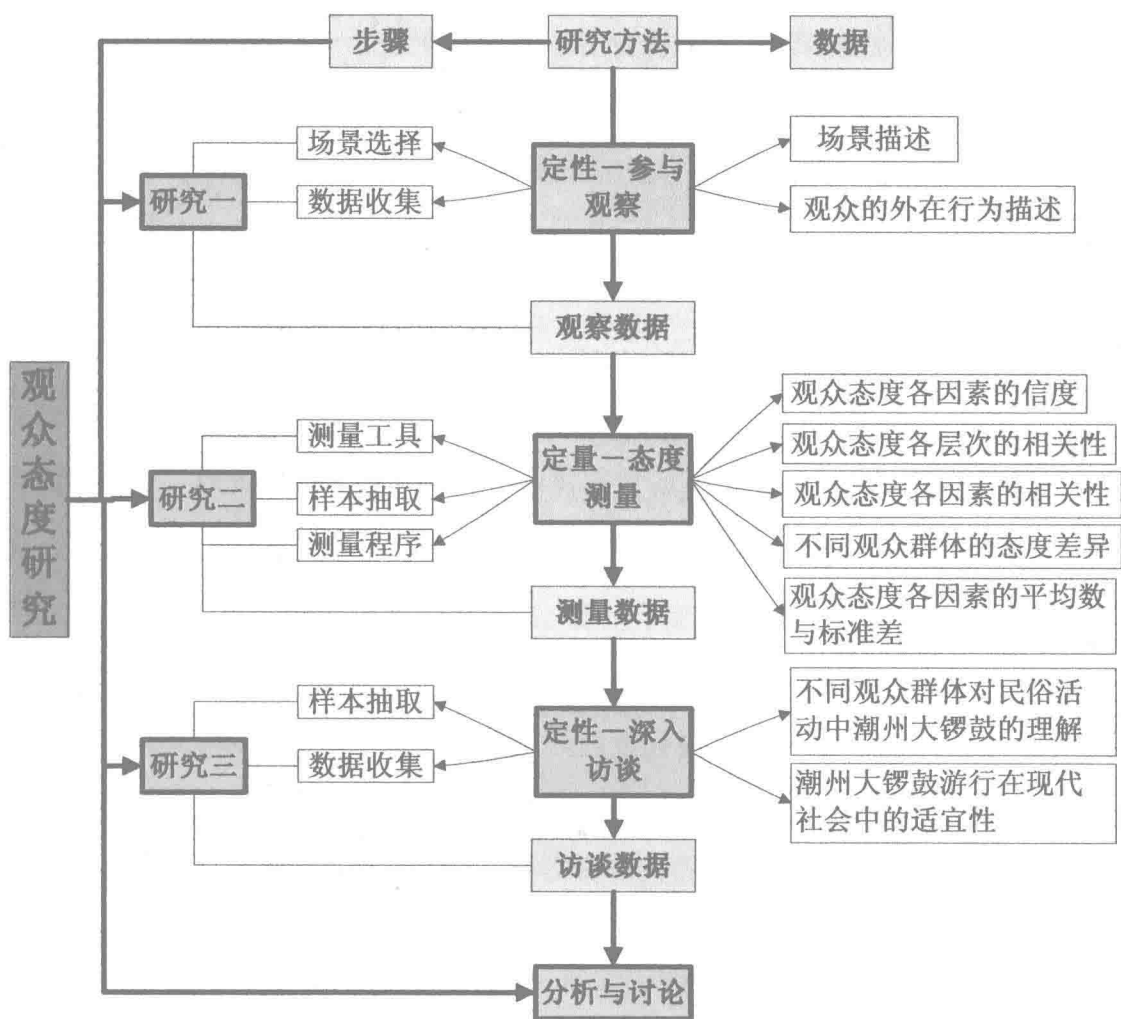


本研究策略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个阶段是定性研究，获得的文本数据将为第二个阶段定量研究提供资料，而第二阶段的实施又将获得第三个阶段定性研究的主题，在第三个阶段的实施中，获得对第一、第二个阶段研究结果的分析 and 解释，此三阶段的结果将在解释中得到整合。

二、逻辑框架及具体对策

(一) 逻辑框架

至此，本研究的逻辑框架已经确立，从以上论述可见，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研究由三个子研究，分别是：第一阶段的定性研究；第二阶段的定量研究；第三阶段的定性研究。这三个子研究呈顺序关系，并且相互验证，形成一个逐步推进的研究架构。如图 4：



（二）具体对策

1. 研究一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研究一，也即第一阶段的研究，所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为参与观察法，所运用参与观察法之考察架构为周凯模教授的音乐人类学实地考察方法十一“W”模式¹。此套考察方法是对音乐人类学实地考察中传统的五“W”（Why、Who、What、When、Where）模式的扩展，其中包含 22 个正求、反求的调查设问，每个正求、反求的设问之下，均提出多项论域，此种实地考察方法细致、全面且成熟的特点，对本研究第一阶段情境性的场景及行为观察而言，极富参考价值。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对参与观察的划分有四类：完全的观察者；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完全的参与者（李晓凤、余双好，2006）。由于笔者是为潮州市意溪人这一“局内人”身份，融入本地文化具有相当的优势，故本研究所

¹ 十一个“W”分别为 Why、Who、What、When、Where、Whom、Whose、Word、Whole、With、How。

采用的观察方法为第四种——完全的参与者。在资料收集之后,对庞大的文本及音像数据进

行编码登录、归类,采取类属分析¹和情境分析²相结合的方式,对资料做出分析,并撰写研究报告。

2. 研究二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在第二阶段研究中,所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为 R.A.Likert 的 5 点量表法,采用自行编制的态度量表,分别从观众态度的三个层面:观众认知、观众情感和观众行为倾向对同一样本予以考察。研究步骤为:第一,分别确定观众认知层面、观众情感层面和观众行为倾向层面的维度,再依据不同层面的各维度编拟认知量表、情感量表和行为倾向量表的题目。第二,将三个量表合为一个题册,在抽取的样本中发放,经过(1)试用与修改;(2)预测试,将收集到的数据编码、输入计算机,在信度、效度检验,项目分析以及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之后,采纳具适宜性的题目,剔除经检验效度不高的题目,编制正式量表题本。第三,将正式量表题本发放于抽取的样本之中,对收集到的数据加以整理、编码、输入计算机,采用最新 SPSS 软件包进行相关分析、标准差与平均数的计算,并进行信、效度的检验。第四,呈现研究结果。

3. 研究三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

第三阶段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为访谈法。首先,需确定访谈的问题;其次,抽取访谈样本,在自然、生活的情境中与访谈对象会晤;再次,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登录、归类,采用类属分析的方式对资料做出分析,最后,撰写研究报告。

4. 整合

对三个阶段的研究加以整合,在“分析与讨论”中对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观众态度做出解释。

三、研究的理论意义

¹ “类属分析”指的是在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现象以及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重要概念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相同属性的资料被归入同一类别,并且以一定的概念命名。一般来说,类属分析的基础是比较,而比较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如同类比较、异类比较、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理论与证据比较等(转自李晓凤、余双好,2006:193)。

² “情境分析”指的是,将资料置放于研究现象所处的自然情境之中,按照故事发生的时序对有关事件和人物进行描述性的分析。这是一种将整体先分散然后再整合的方式,首先看到的是资料的整体情形,然后将资料打碎,进行分解,最后将分解的部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坐落在一个真实情境中的故事。情境分析强调对事物作整体的与动态的呈现(转自李晓凤、余双好,2006:193)。

民俗活动中的潮州大锣鼓作为一种民间传统音乐,其音乐的魅力促使无数研究者一遍又一遍地关注其音乐形态、演奏形式、乐器组成、演奏技巧,仪式过程、社会组织,并在这些方面做出许多成果,但对观众心理的关注,并通过实证或非实证研究对观众于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接受状态作出探究,却是诸多研究者所不曾重点关注的。观众态度对音乐活动,甚至音乐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的意识并不是被动的社会存在的反应,也不是对社会变迁没有影响,人的意识能够对社会和社会变迁产生影响”¹。因而,选择从关注观众态度这一角度涉入,于民俗活动中潮州大锣鼓的研究,于国内音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都将有所补充。其次,本研究的混合研究设计,兼采定性与定量两种研究方法,文字描述与实证数据并重,以及,音乐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都是笔者所作的尝试。

四、论文的内容框架

本研究的内容框架如下:

前言

一、研究前设

(一) 选题原因及研究对象

(二) 学科归属及概念界定

(三) 文献收集及现状评述

二、研究构思

(一) 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二) 逻辑框架及具体对策

(三) 研究的理论意义

三、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第一部分 研究一: 活动场景与行为的参与观察

一、研究取样

二、数据收集

三、研究结果

¹ 取自 2007 年 9 月 19 日周凯模教授于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艺术社会学》课上的讲义。

第二部分 研究二：观众态度量表的编制与测量

一、理论基础

二、预试量表的编制与测量

（一）预试题目的编拟

（二）预试题目的试用与修改

（三）预试工作的开展

（四）因素分析的从事

三、正式量表的编制与测量

（一）观众态度各因素的信度

（二）观众态度各层次的相关性

（三）观众态度各维度的相关性

（四）观众态度与各层次的相关性

（五）观众态度各维度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第三部分：研究三：观众态度的访谈研究

一、研究取样

二、数据收集

三、研究结果

第四部分：分析与讨论

一、观众态度各层次的相关性讨论

二、观众态度各维度的相关性讨论

三、观众态度与各层次的相关性讨论

四、不同年龄群体观众态度的差异

五、不同性别群体观众态度的差异

六、不同文化程度群体观众态度的差异

结论与展望

第三部分

一、研究的伦理问题

无论在本研究的哪一步骤中,伦理问题从没有消失。近年来,研究的伦理问题愈发受到国外学者及研究团体的重视,美国心理协会甚至于1992年写作了《心理学工作者的伦理学原则和行为规范》(Ethical principle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¹,公布了有关的标准或规范。故笔者认为,对于研究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应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

(一) 资料收集中的伦理问题

关于资料收集中的伦理问题,笔者将重点奉承以下几点原则:自愿参与原则、尊重场景原则及权益保护原则。

1. 自愿参与原则

(1) 说明目的,明确对参与者的影响

开诚布公地将研究者的研究程序、目的、和可能的正、负面影响告诉参与者,以便参与者了解研究的实质及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而决定是否愿意配合研究者的研究开展。

(2) 获得许可,充分尊重参与者的自由

秉承自愿参加的原则,在获得参与者许可的情况下,邀其加入研究,并尊重参与者在任何时候退出的权利,避免强迫其参加本研究。

2. 尊重场景原则

无论在定性研究的参与观察、访谈部分,还是在定量研究的测量部分,都将遇到研究场景的问题,在尊重场景原则之下,研究者将做到:

(1) 尊重研究场景,避免影响或破坏

参与观察必定需要长时间的参与、观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时刻注意观察、摄影及笔录等研究行为给活动场景带来的干扰,并尽量将干扰减至最低程度,在有可能影响到场景的情况下,事先征得组织者及参与者的同意。

(2) 选择研究时机,避免打搅参与者的正常活动

同样,在测量或在访谈过程中,也将秉承这一原则,选择合适测量、访谈的时机,避免打搅参与者的正常作息及活动时间。

¹ 资料来源: www.apa.org/ethics/code.html